中國革命的複雜面向
——評周錫瑞《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

● 黃超然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著，石岩譯：《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1）。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是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其先後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等處就學，師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魏斐德（Frederick E. Wakeman, Jr.）等大師，長期從事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代表作有《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義和團運動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等①。《意外的聖地：陝甘革命的起源》（*Accidental Holy L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Northwest China*，以下簡稱《聖地》，引用只註頁碼）是周錫瑞的最新力作，書籍出版之際，學界反響熱烈，楊奎松、陳永發、石川禎浩、金耀基等大家均對本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陝北革命一向為海內外各方學者關注重視，原因不外乎陝北於中共革命存續有着非比尋常之意義。

陝北革命一向為海內外各方學者關注重視，原因不外乎陝北於中共革命存續有着非比尋常之意義。《意外的聖地》試圖對陝北革命的若干歷史問題做出新的詮釋，也致力於強調「事物是複雜的」，中共的革命史也不例外。

*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張志偉編輯以及董國強教授，他們為本文的改定提出了寶貴的建議。本文文責自負。

數十年來，中共官方和中國大陸出版的陝北革命史著可謂汗牛充棟；海外學界亦有圍繞塞爾登（Mark Selden）所提「延安道路」的長期論爭，陳永發、陳耀煌等中共史研究權威亦涉入其中②。至目前為止，諸多成果已較好地展現了1930年代中期以後陝北共產革命的不同面向，但唯獨乏見對這場革命的地方起源的系統研究，而新近出版的《聖地》一書無疑填補了這一遺憾。本書不僅試圖對陝北革命的若干歷史問題做出新的詮釋，也致力於強調「歷史最重要的一課是：事物是複雜的」（頁399），中共的革命史也不例外。

周錫瑞從1980年代末開始進入陝北進行訪談，發掘革命起源的「地方性」。他步入學界時正逢1960年代越南戰爭，對農民革命的討論風靡一時，他也因此持續關注造反、革命等社會運動，並且對中國地方社會結構的多樣性產生了極大的興趣。

《聖地》一書論述的陝北革命在學界是經典的「老問題」，要從這樣一個前人研究無數的舊故事裏探得新知實屬不易。那麼周錫瑞何以能取得突破？首先不能不談及其家庭生活經歷。周錫瑞之妻葉娃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就插隊陝北，後求學於西北大學，任職於陝西考古所，夫妻兩人也曾與兒女長期生活在西安；周錫瑞本人從1980年代末就開始進入陝北進行訪談，正是憑藉對這片土地的感情與了解，他才能發掘出革命起源的「地方性」。同時，周錫瑞的治學經歷也對《聖地》的撰寫助益良多，他步入學界時正逢1960年代越南戰爭，對農民革命的討論風靡一時，他也因此持續關注造反、革命等社會運動，並且對中國地方社會結構的多樣性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深入基層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對農民、農村有着深刻的理解。這些獨特的經歷成為周錫瑞與陝北、農民革命、地方社會的「紐帶」，提供了一些史料、視野、方法上的新資源，從而使《聖地》描述的陝北革命呈現出不同的複雜面貌。在下文中，筆者將首先對全書內容進行概括，然後分析本書對複雜的革命歷史的還原，最後就本書的缺憾與意義進行總結。

一　全書內容概要

本書以時間為順序，圍繞陝北革命的起源這一中心話題，分六章敘述。第一章討論共產革命前的陝北歷史。作者指出陝北處於古代中原政權的邊疆，長期飽受戰亂之苦，特別是到了明末，饑荒、農民戰爭等問題困擾着此地，以至於陝北在有清一代都未能走出貧困。十九世紀中葉，回亂的爆發對陝北社會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是叛亂直接導致西北部的陝甘交界區人口銳減，匪禍頻發，而陝東北受影響相對小，經濟有所恢復，孕育出更多的士紳——這為日後陝北革命產生兩種不同的路徑埋下了伏筆；另一方面則是左宗棠平叛的軍隊把哥老會帶到了陝北——這個組織成為了陝北辛亥革命的核心力量，並最終推翻了清廷在當地的統治。

第二章主要論述陝西共產革命的草創階段。陝西共產革命發端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受五四精神啟發，於1920和1921年分別創辦《秦鐘》、《共進》等新雜誌，後者是「共進社」的刊物，傳播左翼思想。左翼活動起初受到

井岳秀等權勢精英人物的庇護，1924至1925年間，黨團組織逐漸在綏德等地的學校中站穩了陣腳。國民革命開始後，借助馮玉祥的支持，中共陝西黨迅速壯大，由此順利地組織了一系列農民運動。然而好景不長，1927年馮玉祥與共產革命分道揚鑣，中共被迫獨立進行革命，策動清澗、渭華等暴動，但都以失敗告終。陝西省委之後繼續激進的暴動方針，並進行內部清洗，造成陝西黨元氣大傷，城市革命陷入低潮，而新的革命則從邊緣地區陝北的農村開始。

第三章聚焦1920年代末、30年代初陝北革命的發展，這場革命的主角是劉志丹和謝子長。劉主要在陝甘邊境活動，利用個人人脈和哥老會的組織網絡來收編各種土匪、民團，組成一支游擊隊。這支部隊在1931年引起了陝西省委的注意，省委派謝子長去領導，謝看不慣游擊隊的「土匪」作風，嚴加整肅，一方面使游擊隊實力大減，另一方面也埋下日後劉謝二人矛盾的隱患。1932年底，陝甘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但軍黨矛盾隨即發生，省委執行左傾路線，認為紅軍的游擊戰是「逃跑主義」，強迫紅軍向渭華這些富庶地區進攻。1933年，紅軍的軍事冒險慘遭失敗，同一時期激進的城市工作也導致省委暴露，陝西黨組織因被叛徒出賣幾乎全軍覆沒，不過反而給陝北的革命者更多的探索空間。

第四章主要討論1933至1935年陝北革命不同的探索與實踐。劉志丹帶領紅軍轉戰南梁，吸收鴉片販子及保鏢、哥老會成員進入紅軍，重整旗鼓，總體上是「槍強黨弱」；不同於劉，謝子長則受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委派到陝東北活動，利用鄉村學校和家族網絡發展黨組織，但他的嘗試沒有得到學生和農民的堅定支持，總體上是「有黨無槍」，劉謝二人合作互補在險峻的革命形勢下似有必要。1934年南梁閻家窪子會議上，劉謝二人開始嘗試合作，但謝卻帶來了中共北方代表對紅26軍「土匪色彩」、「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等的批評，雙方發生激烈爭論。不久後謝因傷去世，劉再次成為陝北革命的唯一領導者。1935年，面對國民黨的圍剿，劉帶領紅軍進入人口更多的陝東北，利用當地更成熟的黨組織發動群眾，於夏季一舉攻佔七座縣城，建立了穩定的蘇區。但同年受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委派到當地的朱理治卻無視劉的成績，批評紅26軍「右傾取消主義」（即「意圖取消黨的領導地位」，頁230），並借助謝的舊部和剛到達陝北的徐海東及其紅25軍的支持，對劉部展開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這場大規模的整肅一直持續到中共中央到來之後。

第五章論述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到達後陝北革命的新征程，着重討論中共扎根陝北延安的偶然性。由於肅反與激進的、集中火力對付豪紳和地主的「查田運動」，陝北根據地一度岌岌可危，直到中共中央的到來才改變了形勢。但毛澤東等人的選擇也充滿偶然性，長征並不是注定要以陝北為終點。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上，中央的目

長征並不是注定要以陝北為終點。在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會議上，中央的目標是要「打通同國際的聯繫」，「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陝、甘都只是中轉站的備選項之一，直到毛得知陝北蘇維埃的存在，才決定進軍陝北。

標是要「打通同國際的聯繫」，「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③；陝、甘都只是中轉站的備選項之一，直到毛在甘肅讀報時得知陝北蘇維埃的存在，才決定進軍陝北。正如作者在上一章中提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來後陸續叫停了激烈的肅反；不同於中國大陸不少論著有意強調毛等人的糾偏有功，周錫瑞指出這種糾偏也有限界：第一，逮捕、處決在中共中央到來後仍然繼續；第二，中央對肅反的處理是「各打五十大板」，認為「肅反運動確實有必要，也確實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且實際上仍選擇依靠徐海東及其部隊，把劉志丹等人邊緣化（頁246-47）。此外，抵達後的中共中央也發覺極度貧困的陝北並非最佳落腳點，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黨的領導人不得不寄希望於蘇聯援助，為此在1936年接連發起東征、西征（即中共為求得生存而向東往山西、向西往寧夏等地進行的軍事行動），以打通國際交通線。然而東征受阻，劉志丹犧牲；此後寧夏戰役也失利，紅軍被湯恩伯、胡宗南等國民黨軍隊困於陝甘寧一隅。危急存亡之時，又一場「意外」發生——先期對東北軍和西北軍的統戰工作終於發揮作用，張學良、楊虎城發起「西安事變」囚禁蔣介石，中共的危機暫時得到緩解。

第六章講述延安時代的開端。1937年1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移駐延安，但是此前的西安事變並沒有使中共完全轉危為安，兩黨進行艱難談判的同時，中共盟友東北軍、西北軍已被陸續調離陝北，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嚴密封鎖了陝北周邊，中共再無可能轉赴他處，陝北已由可能的中轉站變為革命根據地的唯一選項。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的爆發，加速了國共談判交涉的進程，9月發布、由中共起草的〈國共合作宣言〉終於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了陝甘寧邊區的合法性。中日戰爭前期，中共又經過與周邊國民黨軍隊的摩擦、鬥爭，放棄了甘肅東部的一部分，獲得了陝東北的一部分，根據地的四至邊界在1940年基本確定。同時，以延安為中心的新政權積極推行剿匪、鋤奸、普及教育、民主選舉、婦女青年工作、整風運動等，把社會逐步納入了共產革命的軌道，為中共的成功奠定了至關重要的基礎。

周錫瑞在實證基礎上進行了理論昇華，總結了陝北革命史的啟示：一是革命與地方性；二是革命與暴力；三是中共政權與社會變革；四是意識形態對中共革命的意義。

最後，在「結語」部分，周錫瑞在實證基礎上進行了理論昇華，總結了陝北革命史的啟示：一是革命與地方性。陝北革命的興起有賴於地方的社會網絡（特別是當地人的作用），但同時這種地方性又會阻礙黨的領導與革命推進。二是革命與暴力。在1940年代邊區政權穩固以後，中共的革命暴力已有所減弱，不再濫用肉體消滅手段。三是中共政權與社會變革。作者認為並不是社會變革導致了中共政權的產生，恰恰是中共的軍事、政治控制才使陝北能獨立於國民黨政權以外，同時也無需唯蘇聯馬首是瞻，從而開始獨特的社會變革。四是意識形態對中共革命的意義。中共通過向農民等群體灌輸革命必勝等「信念」，有助於革命隊伍的維持、壯大。

二　還原複雜的革命圖景

《聖地》一書最大的亮點在於充分還原了陝北革命的複雜面貌。針對革命的複雜性，作者着重從兩方面進行實證性的還原：一是從社會經濟的視野切入，解釋革命發展與陝北地方社會的關係；二是跳出官方話語的局限，關注陝北成為「革命聖地」的歷史偶然與「意外」。這兩方面的嘗試都大大推進了我們對革命多重面向的理解。

(一) 社會經濟視野與地方革命

研究陝西或西北革命的通史不勝枚舉，尤其是中國大陸已出版了大量相關的地方革命史著，這些革命史書寫的起點或是五四運動④，或是中共建黨⑤，或是國民革命失敗前後⑥。只有海外學者塞爾登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一書較多論及了革命前陝北的地形地貌和農村農民情況⑦。《聖地》一書的書寫取向接近塞爾登，甚至花了更多的篇幅——至少整整一章來描摹一段革命前史：從先秦到民國初年的陝北社會經濟狀況。如是將社會經濟視野同地方革命研究結合，其實反映了近幾十年海外中國革命研究的轉向。西方學界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在1970年代就已出現「地方化」的嘗試⑧，此後的研究者陸續開始把革命的發生、發展納入地方的歷史進程和具體環境中加以考察，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黃宗智、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弗里德曼 (Edward Friedman) 等學者的著述都是革命研究的地方轉向之典範，其中涉及農村經濟狀況、鄉村社會結構乃至農民的生活、心態等方方面面⑨。周錫瑞亦是這股潮流的領軍人物，其早期著作《改良與革命》關注清末民初的兩湖地區，以經濟危機的發生、下層社會的不滿來解釋清末新政的失敗與革命的興起；《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則考察魯西地區的社會經濟，通過魯西南和魯西北的地域性差異來分析大刀會與義和團神拳的不同。《聖地》一書則是社會經濟視野與地方革命研究的又一次成功結合，這種結合推動了新史料的運用，進而對陝北革命做出了新的解釋。

周錫瑞曾主張：「中共黨國始終是社會、群眾、既存歷史文化的一部分。」⑩在他的研究中，共產革命是一場地方革命，這種視角當然離不開對地方社會經濟情況的準確描摹。《聖地》一書不僅系統地運用地方志、中共革命時期的檔案文件、各方人士的回憶資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中統) 的調查記錄等，還大膽引入了一般革命史研究不常使用的口述史料。周錫瑞從1989年開始到陝西進行實地調研，集中訪談當地農民，積累了一定數量的口述資料⑪，《聖地》一書就至少使用了二十二位受訪者的口述史料 (頁401-402)。這些訪談涉及到陝北早期革命者的家庭條件與個人經歷、地方民團頭領的家庭出身、鄉村土地佔有的情況、政治運動的負面影響等，豐富了革命史書寫的圖景。也正是憑藉各種豐富多元的資料，《聖地》才得

《聖地》一書最大的亮點在於充分還原了陝北革命的複雜面貌：一是從社會經濟的視野切入，解釋革命發展與陝北地方社會的關係；二是跳出官方話語的局限，關注陝北成為「革命聖地」的歷史偶然與「意外」。

以超越《延安道路》等經典，對陝北革命做出更客觀全面的論述。

尤為值得肯定的是，《聖地》憑藉系統的史料對陝北革命進行了長時段的考察，指出陝北革命的諸多重大問題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回亂，正是這場戰亂導致陝甘交界處和陝東北的社會經濟發生了明顯的分化，從而影響到日後劉志丹、謝子長兩人不同的革命模式以及「陝甘黨」和「陝北黨」的恩恩怨怨，甚至還與1930年代後期中共陝甘寧邊區範圍的「西退東進」(即國共摩擦時中共勢力在甘肅部分地區的退卻及在陝北東部數縣的鞏固發展)有關。這無疑是跳出了傳統中共史研究中常見的政策分析法、權力鬥爭論等，從更宏闊的視野透視了革命差異、黨內矛盾、邊區擴展背後地方的結構性因素，撇開革命本身來解釋革命在地方的歷史淵源。

《聖地》憑藉系統的史料對陝北革命進行了長時段的考察，指出陝北革命的諸多重大問題可以追溯至清末的回亂。這無疑是跳出了傳統中共史研究中常見的政策分析法、權力鬥爭論等，來解釋革命在地方的歷史淵源。

本書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從社會經濟的角度溯源陝北肅反。言及陝北肅反的發生，學界以往莫衷一是，不少研究遵循官方說法把肅反歸咎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其中甚至有論者專門強調劉謝二人的革命情誼⑫；也有研究把肅反與張慕陶的問題聯繫起來⑬；而另一些研究者則強調劉謝兩人的分歧，並以此進一步解讀紅26軍與上級黨組織(陝西省委、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的矛盾衝突⑭。周錫瑞則另闢蹊徑，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對這一政治事件的源頭進行了更遠的追溯——即陝北西部陝甘交界處和陝北東部的不同社會經濟環境影響了日後劉謝兩方迥異的革命實踐和探索，這種差異就導致革命交匯之際難免有嫌隙、摩擦，再加上劉謝兩人領導方式的差異(劉輕鬆融洽，謝嚴厲果斷)、「陝甘黨」與「陝北黨」歷史上不同的隸屬關係(陝甘邊特委受陝西省委領導，省委遭破壞後一度處於獨立活動狀態；陝北特委則先後隸屬陝西省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等)、長期的軍黨矛盾發展(陝甘邊紅軍與中共陝西省委、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本地紅軍與外來紅軍(紅26軍與紅25軍)的權力爭奪等的催化，肅反在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終於發生。

綜上所述，陝北革命從起源到發展，無不受到地方社會經濟因素的嵌入性影響，這更提醒我們尤有必要重視：「地方是我們認識中國共產黨和中共革命的基本空間。」⑮

(二)革命進程中的偶然因素

歷史進程往往充滿了無數的偶然，中國的共產革命也不例外。然而由於種種眾所周知的現實原因，革命成功的偶然因素往往無法得到足夠的重視，比如對中共中央最終落腳陝北，一些重要的官修史書只用隻言片語來定性中國革命轉危為安、中國革命奠基西北，對「奠基」的具體過程語焉不詳⑯；還有不少論著從陝北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西北紅軍策應南方紅軍戰略轉移、黨中央的偉大路線領導、根據地黨的正確策略方針等方面，專門突出黨中央選擇陝北的歷史必然性⑰。實事求是地講，這些論著的定調或觀點不無道理：一方面賦予了長征勝利與革命中心轉移更多的神聖

性，另一方面也確實解釋了中國革命落腳陝北的部分原因；但這些並不是革命歷史的全貌。正如周錫瑞形容：「我讀了許多中共黨史的研究著述，感覺到〔中國〕國內好像普遍認為革命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大家並不認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具有必然性。」⑱

在《聖地》一書中，作者指出，延安時代的開啟「是一系列具體原因在無從預知和預定的情況下所造就」(頁397)。中共中央抵達陝北前後的一系列事件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比如，前面提到毛澤東是通過報紙才偶然得知陝北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中共中央起初並未打算長駐陝北，而是決定東征、西征，試圖跳出陝北；直到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才囿於現實而逐漸放棄轉戰的設想，在與國民黨的交涉、摩擦中逐步確立了中共中央在陝北的政治局面。

通過周錫瑞的論述，不難看出中國革命在陝北奠基的初期確實受諸多偶然事件的影響。一方面，這些「意外」充分體現了共產革命的曲折艱難，使今人得以在必然性的革命敘事以外，體悟到中共領導先驅求索成功之道的坎坷，進而理解中國革命的意義。另一方面，從以陝北為中轉站到落腳點，左右地方革命進程的諸多「意外」其實並不全是來自地方社會本身，中共中央與紅軍、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蘇聯和共產國際等多方外部勢力都深深介入了這一系列「意外」的製造——這也是《聖地》一書的獨到之處。地方史研究並不拘泥於陝北「地方」本身，而是結合全國的、國際的視域來理解陝北革命進程。這些研究足以表明：「革命所採取的具體形式由地方、國內、國際形形色色的偶然性(contingency)造就，只有通過對於細節及歷史的『偶然』/『意外』進行實實在在的分析，才能加以揭示。」(頁397)藉此，周錫瑞也進一步明確表達了他的關懷，即歷史學家應區分利用歷史和書寫歷史(頁398)。當年的革命者為動員革命、今日的執政者為政治宣教，都難免會利用陝北革命歷史來論證「中國共產黨為甚麼能」，但這不是歷史的全貌，史學家書寫不應忽略的是，任何歷史的演進，都不乏一些至關重要的機緣巧合。

三　缺憾與意義

《聖地》一書也有一些缺憾值得指出。首先是作者的部分觀點過於武斷。比如在「結語」部分，周錫瑞提出：「毛澤東從不想留在延安，延安時代本身就是歷史的『偶然』/『意外』。」(頁397)前文已經述及，中共中央在陝北的形塑過程確實充滿偶然性，官方背景的論著往往有意無意忽略了這些重要的偶然因素，但也不應矯枉過正，認為延安時代純係歷史的偶然。須知，中共在陝北是「大有作為」，比如《聖地》第六章就展現了1930年代後期中共以剿匪、徵兵、選舉等方式改造地方社會的圖景，但這些舉措也都只是「開端」，之後才是意義更重大、影響更深遠的「重頭戲」——1940年代陝甘寧邊區大規模的經

從以陝北為中轉站到落腳點，左右地方革命進程的諸多「意外」其實並不全是來自地方社會本身，中共中央與紅軍、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蘇聯和共產國際等多方外部勢力都深深介入了這一系列「意外」的製造。

濟、政治運動才能在真正意義上代表延安時代。陳永發便指出，1940年代中共通過減租減息、大生產運動以及鴉片貿易等，大大改善了邊區的經濟狀況；同時經由整風運動，使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並且有效建立起黨員和幹部的共識和忠誠⑲。而這些運動取得的成效顯然難以用「偶然」或「意外」來形容。也許是作者缺少更多的一手史料，又或者是出於其他原因，對1940年以後的陝北革命史關注不足，因而有略顯偏頗的論斷。在筆者看來，延安時代的起源或有諸多偶然，但延安時代的成就則更多體現了歷史的必然性——恰恰是中共主動積極的探索與實踐，才造就陝北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起點；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延安時代的起源或有諸多偶然，但延安時代的成就則更多體現了歷史的必然性——恰恰是中共主動積極的探索與實踐，才造就陝北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起點；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然後是書末總結的四個主題的啟示，除了革命與地方性這一主題外，其他幾個主題在全書的論述邏輯中其實並不突出。或許是受限於篇幅，亦或許是囿於資料問題，總之，對革命與暴力、中共政權與社會變革、意識形態對中共革命的意義等問題的研討還有很大的推進空間。如能結合其他時段、其他地域的中共歷史來分析，對解答這些問題也許會有更豐富的答案。

最後是本書的研究脈絡應可作出進一步的延展。前文已經述及，《聖地》一書從古代書寫至二十世紀，長時間地溯源陝北革命，其縱向的深入研究可謂傑出。然而，共產革命並非陝北一地之產物，贛南閩西、鄂豫皖、湘鄂西等地皆有中共的革命根據地，它們的形成、發展及內部整肅是否可以與陝北進行比對與聯繫？尤其像肅反，實為各根據地共有的「經歷」，其中關聯與邏輯值得進一步挖掘。換言之，陝北革命與其他地區革命的共性和差異，亦可在更多的橫向對比研究中凸顯出來。

儘管有些缺憾，但《聖地》仍不失為一部傑出的革命史著作。本書可以視作國內革命史研究的「他山之石」。長期以來，國內的傳統革命史敘事存在着將「革命」概念的豐富內涵簡單化的取向，很多研究局限於宏大敘事，缺乏對地方的微觀理解；過於強調個別標誌性事件，忽略了對長時段的考察；過多地從當下出發挖掘歷史的必然性意義，而對一些偶然因素關注不足；史料來源單一，革命史書寫成為大型檔案文書彙編……而《聖地》一書則成功地展現了革命的複雜面向，無論是從社會經濟視野理解地方革命，還是對革命進程中歷史偶然性的發現等，都能為治革命史之學人提供重要的借鑒。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國內革命史研究也已經出現了令人矚目的「新革命史」主張。李金錚於十多年前就提出倡議：應「加強中共革命史與中國鄉村史的連接」，同時應把社會史引入，重視革命時期國家與社會的上下互動；而且要從全球視野理解中共革命；要將革命的研究時段拉長，跨過1949年，把革命史和新中國史聯繫起來⑳。這些提法在學界引起熱烈反響，諸多重量級學者圍繞「新革命史」的理論、

方法等展開討論，反思傳統革命史的不足㉑，不少新的研究也開始嘗試把「新革命史」納入學術實踐㉒，形成了一股「新革命史熱」。在筆者看來，國內「新革命史」的主要主張與《聖地》一書的研究理念頗為相近，從這個意義上來講，《聖地》同樣可以為「新革命史」的研究提供啟發。

註釋

① Joseph W. Es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② 參見塞爾登（Mark Selden）著，魏曉明、馮崇義譯：《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1-3；〈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新史學》，第1卷第4期（1990年12月），頁41-44、110-14；陳耀煌：〈統籌與自給之間：中共陝甘寧邊區的財經政策與金融、貿易體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2期（2011年6月），頁138-40。

③ 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479。

④ 參見房成祥：《陝西通史．革命根據地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⑤ 參見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14）。

⑥ 參見房成祥、黃兆安主編：《陝甘寧邊區革命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張宏志：《西北革命根據地史》（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0）。

⑦ 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頁9-24。

⑧ 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革命史研究述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2010年6月），頁152。

⑨ 參見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rasenjit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⑩ 參見Joseph W. Esherick, "Deconstruc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tate: Gulin County in the Shaan-Gan-Ning Border Regi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40 (December 1994), 1078；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頁163。

⑪ 周錫瑞、周武：〈從社會史到文化史：當代美國中國學的典範轉移——訪周錫瑞教授〉，《歷史教學問題》，2012年第5期，頁31。

⑫ 參見房成祥：《陝西通史．革命根據地卷》，頁170-74；張宏志：《西北革命根據地史》，頁302-305；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史》，頁364-70；宋金壽：〈我了解的西北革命根據地肅反〉，《炎黃春

秋》，2012年第10期，頁47-55；張化民、拓宏偉：〈「陝北肅反」起因再研究〉，《黨史研究與教學》，2013年第4期，頁67-85；李東朗：〈「西北歷史問題」的由來〉，《黨史博覽》，2014年第9期，頁4-11。其中宋金壽和張化民、拓宏偉的文章專門強調劉謝二人的革命情誼。

⑬ 張慕陶是中共黨史上的爭議人物，曾與中共陝西黨有一定的歷史淵源。他先後擔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常委，其後又擔任過順直省委組織部長、省委書記，張家口特委書記等黨內要職。1933年擔任張家口特委書記期間，張慕陶與河北省委前委書記柯慶施因路線方針等問題產生分歧，後被河北省委定性為「右派」並遭開除黨籍，之後一度被視作黨內「右傾取消主義」、「投降主義」的代表。有關張慕陶問題與陝北肅反的關係，參見田潤民：〈陝北「肅反」與張慕陶〉，《西部學刊》，2014年第7期，頁38-42。

⑭ 參見魏德平：〈「陝北肅反」的來龍去脈〉，《黨史研究與教學》，2010年第5期，頁39-51；黃正林：〈1935年陝甘邊蘇區和紅26軍肅反問題考論〉，《史學月刊》，2011年第6期，頁56-68；王曉中：〈中顧委主持解決「西北問題」〉，《炎黃春秋》，2011年第8期，頁21-25；石川禎浩著，鞠霞譯：〈小說《劉志丹》事件的歷史背景〉，《日本當代中國研究》（2012年），www.waseda.jp/prj-wiccs/wp/wp-content/uploads/2012/07/jscc2012.pdf，頁16-55；黃正林、温艷：〈民團、農民武裝與陝甘邊紅軍的建立及影響〉，《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5期，頁82-84。

⑮ 黎志輝：〈地方社會變革中的中共革命——作為視角和方法的中共地方革命史研究〉，《蘇區研究》，2016年第4期，頁76。

⑯ 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頁393-95；《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頁160-65。

⑰ 參見任學嶺：《陝甘革命根據地史》，頁242-45；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西北革命根據地史》，頁457-71；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與中國革命研究課題組：〈論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碩果僅存」的歷史必然性〉，《中共黨史研究》，2011年第10期，頁15-26。

⑱ 周錫瑞：〈從農村調查看陝北早期革命史〉，載南開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編：《中外學者論抗日根據地——南開大學第二屆中國抗日根據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頁535。

⑲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上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頁363-66、399-400。

⑳ 李金錚：〈向「新革命史」轉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與突破〉，《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頁73-83。

㉑ 參見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5期，頁96-106；應星：〈新革命史：問題與方法〉，《婦女研究論叢》，2017年第5期，頁5-8；陳紅民：〈「新革命史」學術概念的省思：何為新，為何新，如何新？〉，《蘇區研究》，2018年第5期，頁9-13；李里峰：〈黨史和革命史研究的舊與新〉、唐小兵：〈「新革命史」語境下思想文化史與社會文化史的學術路徑〉，《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頁16-20、30-34。

㉒ 參見李里峰：〈何謂「新革命史」：學術回顧與概念分疏〉，《中共黨史研究》，2019年第11期，頁38-43。

黃超然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生